

略论早期泉州海外华商深厚的回报

陈东有

一 回报是一种传统

晋江的大仑《蔡氏族谱》说到明朝嘉靖年间出洋经商的人是如何思念家乡、不忘兄弟、回报同宗之事云：“景思、景秩为弟，周夫为兄，均有骨肉厚爱。思叔弟也，……娶妇后，遂往吕宋求赏，叠寄润于兄弟。二兄景超全家赖之，修理旧宇，俾有宁居。末后归来，仍分惠银两，各拨十五石与兄及侄，管掌为业。秩季弟也，……乙丑年（1565年）自吕宋归，将所赏买地盖屋，与兄侄公分。周夫伯兄也，……弱冠，遂求赏吕宋，初归娶妇，再归为二弟择姻娶妇，赎祖地基及宅盖屋，皆自己赏，与弟公分。仍同二弟往吕宋，出本银令之经纪，日后各有四十余金，归又拨租十石，付其管业……”^①这史料讲述了蔡氏四兄弟之间相互帮助提携之事，其中透露出的主要是在外经商发财物兄弟如何将自己在外获得的利润送回家来回报家乡兄弟。回报的内容主要有：养家、修屋、惠亲、娶妇、赎回祖业、牵引亲人出国并帮助他立业。在鸦片战争之后，由于出国人数大增，海外华商日众，华商与祖国、故乡、家族的关系更为密切，回报的特征也就越加明显。族谱中的记载有：“振兴设乡校诗宅小学，初得其常年辅助费，嗣则与指已同倡建校舍。”^②“新木公自幼家贫，偕兄弟与其父挈眷出洋，旅居星洲，……即我乡之庵岩及族谱、桥梁、石路各义举，尤多捐输。”^③方志中也有记载，有的还说出了这种传统的原因。同安籍华商曾妈庇（又名广庇），十四岁出洋，“经营二十

余载，获货三千余万。性至孝，问母所欲。母曰：‘吾家素贫，深知疾苦，但愿汝以多金周乡邻之急于颇足矣’庇随汇款给贫人以博亲欢”。^④同安籍华商杜文艮在外经商成功归来，“性慷慨，好施赈及修桥造路，凡有善举，辄独立肩之，虽巨货不惜也。偶不敷用，辄称贷于人而偿其息，恒达数万金无所吝。计自光绪丁亥（1887年）至戊申年（1908年），善举费至三十余万金以上，自奉甚薄，俭约如常人”。^⑤同安人柯祖仕出国谋生经商，二十年不到，“家拥巨货，然赋性耿直，然诺不苟，未尝始诺终负，待人一秉至诚，不因富而优礼贫而傲色，故人咸乐就之”。^⑥著名华商黄奕住自幼得母亲言传身教，孝顺勤谨，立志自立，“远涉重洋而爪亚而三宝壟而新加坡、绵兰各埠二十年，刻苦经营，巨富之名大震，皆其母之训诲激励有以成之也”。民国初年，其父谢世，母亲迁到厦门鼓浪屿建屋居住，还常常勉励奕住：“我等幸得安土，而乡里戚党仍在水深火热中，不可不设法拯救之。此后若故乡应尽之义务及中外各地方慈善事业，尔辈须体吾志而量力行之，或吾慰矣。”黄奕住后来成为对家乡回报贡献极大的华商之一，“遵母全也”。^⑦对家乡的回报，主要是在资助乡邻戚里，捐资故乡的公益事业。如果说回报同宗同胞是“兴家立业”，那么回报同乡故里就是“光宗耀祖”。当然，回报的动机还不能完全用这八个字来概括，我们从上面数例事迹中还可以进一步揭示更多的动因。

其一，当年被迫出国的原因转化成回报动机中的因素。大部分华商或他们的前辈出

国都是由于家乡人多地瘠和天灾人祸,他们深知这种难以生存的自然社会环境中的艰辛苦痛。他们或将心比心,或以情知理,从而促使自己产生回报行为。

其二,孝心爱心是产生回报的主要原因。许多华商在当年离乡背井之时,告别的是生我养我的父母、携老负幼的妻子、留守家园的兄弟。成功的华商们心中往往生出思念之情,首先是思念这些一直含辛茹苦支持着自己的亲人,而家乡的亲人并不是孤立的,他们一直生活在同宗乡亲构成的宗法共同体之中,所以,华商对亲人的回报不仅仅面向自己的同宗同胞,而是全族,全村甚至更广的关系区域。

其三,广大的怀抱和开拓的精神也是华商回报的原因。很多资料中对具有回报行为的华商评论为“性慷慨”、“性耿直”。说的就是这种原因。人稠地瘠的山乡僻壤很难铸就广阔的胸怀与开拓的精神,广大的海洋或是经历过大海的考验却可以塑造人的这种性格。又加上国际间的商战竞争,宗亲社团、同乡社团、业缘社团乃至突破血缘、地缘和神缘、语缘束缚的更大的联合行动,都造就出“性慷慨”、“性耿直”的华商。这些性格与前二种原因相加,就更加促使了华商给家乡父老乡亲以深厚的回报。

深厚的回报就这样产生了,并渐渐成了中国侨乡的一大传统。回报多种多样,这里把它分类为华侨侨批、华商捐赠、华商投资三部分予以论述。

二 侨批——赡养家小

“侨批”在闽南方言中是侨信、侨汇的俗称。“泉州是中国著名侨乡。旅外侨胞有600多万人,分布在世界90多个国家和地区;归侨、侨眷310多万人,侨汇收入占有全省三分之一强”。“亲情和乡谊是游子与家乡之间割不断的脐带。早期出国(境)的泉籍侨胞在异域筚路蓝缕,胼手胝足,谋求发展,为当地的开发和建设做出极大的贡献。于此同

时,他们心系桑梓,情切家山;不断与国内亲人互通音讯,并将用血汗换来的钱物寄回国内赡养家小,襄助亲友”。^⑧

海外华侨华商汇款回家乡赡养家属的情况,在明末清初就出现了,那时候的“汇”寄钱款,不像现在这么方便,主要是托回家乡的亲朋好友捎带,所以汇款十分困难。鸦片战争后,华侨华商增多,侨眷也多了。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华侨华商纷纷把积攒的钱银托交相识的归侨带回。有的人见此事既是为华侨解难,也可得到手续费,于是专门做起此事,并顺便做点诸如贩卖土特产的商业,这便是“水客”。当时整个福建省,泉州晋江的侨汇最多,“水客”也难以满足广大华侨华商汇寄银款的需求。1871年,晋江安海的郑氏两兄弟创办了第一家专为华侨邮信汇款服务的“批馆”。1877年,永春人黄日兴在厦门又开设了一家民信局。此后,又有二三十家兼营侨批业的民信局、侨栈、汇庄、商号开展营业。1896年,大清邮政局成立,在全国各地遍设邮局,把民营信局纳入管辖,加上轮船的使用,侨信、侨汇方便多了,也快多了。

以晋江县石狮镇的调查表明,侨汇在解放前的用途:

家庭生活费	58%	投资工商业	2%
建筑房屋费	20%	婚丧喜庆费用	13%
地方公益事业费	3%	应酬费	2% ^⑨

可见,用于家庭的支出是侨汇的主要内容,占有93%。所谓建房子、讨老婆、做生日是华侨在家的“三部曲”。^⑩

根据郑林宽的《福建华侨汇款》统计^⑪,1938年福建各市县侨汇总计约7485.65万元(法币),泉州(含晋江)为2500万元,加上南安600万元、永春370万元、安溪364.7万元、惠安322万元、同安50.8万元、金门14.5万元,共计4222万元,占全省侨汇总额的56.4%。又根据《福建省志·华侨志》统计的“1976年本省侨汇分地区(市)统计表”计算,晋江地区为8122.9万元(人民币),占总数的58%,厦门市为743万元,占3%,两

地相加为 8865.9 万元, 占有 63%。由此看来, 泉州地区的侨汇占全省侨汇总额的五分之三或二分之一以上。

寄来的侨汇, 较好地改善了侨眷的生活, 有的达到了富裕的水平。民国时期的陈达所著《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记载甚详: 晋江县六十余万人口, 有二十九万人是侨眷。他们是泉州的特殊阶级, 同时也是泉州命脉。到过南洋的人, 无人不知泉州华侨之多, 泉州人一向也以此自豪。侨眷过去有大富小富之分, 他们分为三种: 第一种是住居农村的, 他们有广大的田地, 衣食可以自给, 侨汇向来被认为是一笔额外的收入; 第二种也是住在农村, 他们的田地足以食用外, 衣着及教育等费须赖侨汇支持; 第三种人是住在城市或小市镇的, 他们一切都赖侨汇的接济。晋江南部沿海的乡村, 如石狮、永宁、深沪、金井四乡, 都是晋属沿海的要冲, 田地最少而侨眷最多。例如永宁乡人口只有二万四千人, 居民十分之七是华侨。又如深沪侨民二万五千人, 生活靠侨汇的占百分之八十。又如金井乡五千人, 侨眷很多, 可耕地没有深沪那样少, 过去商业十分繁盛。^⑩民国初年, 颜文初撰《申报菲岛通信》云: “予昔年过大江南北, 且沿津浦路入北京, 折往山西, 所见乡村, 其人烟之稠密, 建筑之壮丽, 用度之奢侈, 诚未有若闽南者。就晋江一县而言, 计八百余乡, 皆聚族而居, 大乡者万余人, 数见不鲜, 小乡者亦百人以上, 其生活皆藉南洋为挹注, 各乡红砖白垩之建筑物, 弥望皆是, 婚嫁之费, 普通人家开销皆在千金以上。^⑪这一亲眼所见, 也证明了上述侨汇在解放前的用途“华侨有的是钱, 所以凡在泉州开过民信局或钱庄银行的, 莫不看到钱山钱海, 钱流入农村, 流入到商去。”^⑫

三 捐赠——造福家乡

华商慷慨捐赠, 是指华商拿出钱财物资兴办教育、文化和慈善事业如修桥、辅路、救灾扶危、济困以及解决一些诸如械斗的社会

问题、支援和资助国内的革命运动等。为了便于叙说, 这里先以华商人物为纲作一介绍:

南安籍华商戴叔焕“延宿儒修族谱糜费三千余金, 葺仙溪山, 捐修桥路, 岁杪掷金钱施舍贫寡, 悉出实心”, 其弟“叔明负乡邻之望, 倡修始祖祠, 捐修罗溪祠口路, 造厦门炮台捐六百金, 凡诸义举莫不踊跃从事。”^⑬

南安籍华商蔡启昌“商于吕宋, 积赀甚裕, 量宏好善, 捐修文庙考棚, 筑造寺院、桥路, 恤孤怜贫, 施茶舍药, 倡设拯婴堂, 靡不踊跃乐输”。其子蔡资深, “承父志, 家赀拓张数十倍, 捐修文庙贡院、城垣炮台, 数以千万计。晋南斗案层叠, 如内外股许、吴、蔡、石狮吴、黄、青阳庄、张文、斗店及攀鳞、朴山诸乡, 前埔、金坑苏、王、安海黄、陈, 三十都大什姓, 三十一都陈、郑、鹏、洋林、吴, 各处械斗, 皆捐银赔补, 解释。至如修筑寺观桥路, 如浮桥、飞瓦、觉海、灵源、龙山、天心、一片各寺, 安平、曾庄、墟顶、社庄、后溪仔各桥, 安海泉州官桥、岭兜各大路, 捐银皆计千计万。其余如修锦溪大小潘山等处义, 亦捐千余金。比年鼠疫盛行, 死亡枕藉, 施棺木, 设医局, 舍药材, 充书院膏伙, 助丰州学校经费, 恤孺、寡, 敬节孝, 一切义举莫不捐赀赞成。”^⑭

戴氏是由兄及弟, 蔡氏是父传子承, 皆好捐赠, 表现了泉州华商回报传统的继承关系。

因家贫辍举业渡新加坡遭飓风却大难不死的雷骏声经商成功后, “积赀甚厚, 挈眷归, 建广厦奠堂寝以祀先人, 构书斋延名师以课儿侄。青山岭北大路崎岖, 捐赀独建, 又捐筑芦溪桥安溪水灾饥者、溺者数千人, 船粟往哺。”^⑮

“遵母命”的孝子黄奕住“乃独立创办楼霞乡斗南小学校及救济医院, 以安置儿童之就学, 贫病之就医”。“他如新加坡中学校, 爱同小学校, 北京岭南大学、厦门英华书院、教育会女子学校、义务学校, 均热心捐助”。“近复在鼓浪屿特办慈勤女子中学, 继承先

志，规模之大，冠绝一时。”^⑩

华商李耀垣，祖籍南安，“力行公益慈善事业，如修筑山腰至后、风山至洙渊各路约二十余里。邑之澳汀桥、泉之顺洲桥，开元慈儿、养老两院，花桥善举公所之施药、平余、度岁以及各地赈灾救荒，多以千计，少以百计，未曾稍吝。尤热心教育，若创办本乡金山学校，若泉之培元中学，佩实小学，若厦之同文、英华两书院，若南之金陶学校，无不踊跃，乐输巨款。其最为难得者，莫如泉州府学文庙多年失修，染柱蛀损，倾欹在二尺以外。岁在丙寅，当道请吴绅桂先生为募修，耀垣与吴绅交厚，闻之慨然独任鸠工庀材，越年告竣，计费银七千。其两庑以驻军阻碍，略为补苴罅漏而已，复储三千元，备终来续修之用。”^⑪

曾妈庇按母亲的意思“周乡邻之急于颇足矣，庇随汇款给贫人以博亲欢。宣统辛亥，倡乡学校，题款二万元为基金。……复出货三万建筑乡女校并基金。厦设家族龙山学校，概输七千余金为建筑费，继又提任常年费一千四百四十元。同安医院成立，又慨助二万五千金。此报效祖国之大略也。”^⑫

同安籍著名华商陈谦善在海外以无私捐赠帮助同胞而得到华侨华人的拥戴，对祖国故乡“凡可以利桑梓报国家者，或糜己费，或集众款，并鸠集数万备赈”。^⑬

柯祖仕“置祀田为祖祠祭费，设义塾供人来学。每值故乡荒年，购米平糶，迭糜巨金。其余如捐修庙宇，舍药施茶，刊刷善书及筑桥造路，诸善举悉彰彰在人耳目，其尤著者则在于赈贫困恤孤寡，岁以为常。终君身如一日，故至今尤称道不衰。”^⑭

黄志信在光绪“丁酉（1897年）修造灌口前场路，长五六里。己亥（1899年），灌饥，米斗千文，汇洋五千元，在灌设平糶局。辛丑（1901年）捐金七千，重修凤山庙。”^⑮

在大量的近现代泉州海外华商的捐赠事迹中，最多的事迹最大的钱财是投入到教育事业之中。其中，几乎把自己的全部财物都贡献给家乡教育事业的华商第一人是陈嘉庚

先生。1913年，在实业上初有成就的陈嘉庚便在家乡创办新式学校“乡立集美两等学校”，设高小一个年级，初小四个年级，学生135人。1916年10月派胞弟陈敬贤回国筹办集美师范学校和中学，扩建校舍。1921后，投入巨资创办了著名的厦门大学，当时他认捐开办费一百万元当年交清，经常费三百万元分十二年付完。“这个数额，和他当时的全部资产相等”。^⑯此后，又不断投入巨资扩建加强美学村和厦门大学。1919年，他把在新加坡的不动产橡胶园七千英亩和货栈、房地产皮面积150万平方英尺捐作集美学校永远基金。“此后本人生意及产业逐年所得之利除花红之外，我留一部分添入资本，其余所得之额，虽至数百万元，亦尽数寄归祖国，以充教育费用，是乃余之大愿也。”^⑰为了保证办学费作，他把自己的捐赠和海外筹款以集美银行的形式保留下来。该行于1942年创办于永安，以后移设厦门，并先后在香港、上海等地设立分行。根据他的《南侨回忆录》提供的资料计算，自1904年至1931年前后的28年中，共赚1967万元，共支出1331万元。在支出的款项中，用于办学的为847万元，占63.6%，用于家费30万元，占2.3%。^⑱对教育事业的巨大投入，分流了他的大量原本可作为资本的利润，成了他在三十年代实业陷入危机困境的主要原因之一，当时有人劝他停办学校或缩小学校规模，他坚决不肯。某外国垄断集团提出以停止维持集美、厦大两校为条件，把他的企业作为附属公司加以“照顾”，帮他度过实业危机，他断然拒绝，“宁让企业收盘，绝不停办学校！”1936年，他的企业收盘了，可是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仍然在发展。全国唯一的一座大型集合性的教育基地——集美学村，全国最大的综合性重点大学之一、学术水平闻名世界的，培育了成千上万专业人才和数百位杰出人才的厦门大学，耗去了陈嘉庚先生一生的心血，到他临终之际，还交代把国内的存款3342000元全部献出，其中50万元捐作北京华侨博物馆的建筑费，50万元充作集美社福利基金，其

余全部用于集美校舍建筑。

他一生献给文化教育的钱,按照黄金价格计算,约合1981年的一亿美元,人民币一亿伍千万元,创办或资助过的学校超过百所。在私人办教育的历史上,这是前无古人的。把学校办成一个“系统工程”,从幼儿园到大学,形成普及与提高、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相结合的学村,这也是前无古人的。^①

没有陈嘉庚,就没有集美学村和厦门大学。陈嘉庚先生全办以赴办学校的精神也带动了许多华商纷纷捐资助教,资助教育的费用在华商捐赠项目中占的比率最大,不仅与华商们重视家乡教育的观念有关,也与陈嘉庚先生的光辉榜样有关。

1935年,当时泉州下属五县晋江、南安、惠安、同安、安溪,由华侨华商创办或参与捐助的小学732所,平均每3340人有一所小学,他们分别是:晋江人口669785小学222所,平均每校所拥有的人口3018,南安是527167/232/2272,惠安是395240/132/2994,同安是281940/83/3396,安溪是316286/63/5020。1946年平均3—4个乡镇有1所中学,每个乡镇有8—9所小学,每141个人中有1个中学生,每15个人中有1个小学生^②。此后,华侨华商捐资助教的善举继续发展,泉州地区的教育事业在他们的贡献中走在全国的前列。一大批华商都应该写进中国的教育史,支持陈嘉庚的李光前、捐资惠安教育的刘玉水、安溪的李金水,等等,等等。

救灾扶危济困也是海外华商对家乡亲人的一大回报。除了上述人物中的此类善举,还有更多,他们捐款大多不记姓名,由华商团体收集后派专门负责人交给有关部门。而且,对国内灾民的救济,不分泉州、温州,也不论南方北方,一律慷慨捐赈。

“华侨为革命之母”,这是孙中山先生的话。“海外华侨是辛亥革命强有力的支持者”,董必武同志的这句话则是对孙中山先生话的最好解释。^③辛亥革命的主要领导者、组织者、参加者和依靠力量都是华侨,他们不仅

是兴中会、同盟会的主要成员,也是当时许多起义的骨干。厦门籍华商陈楚楠是南洋同盟会的创建人之一,被誉为“南洋革命党第一人”。华商慷慨捐赠经费和物资,陈楚楠捐献巨款,甚至发生兄弟分产案件。同安籍华商庄银安多次捐款,每次数千元。永春籍华商郑成快捐资达五六万元。^④抗日战争中,世界各地华侨华商同仇敌忾,为争取民族的生存,出资出力,更是壮举。

四 投资——自强国强

华商向国内投资兴办实业,主要起自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当时,作为当地资本的华商已经强大起来,在海外拥有自己的竞争力量的同时,也有向祖国延伸经营、发展资本的欲望与能力;中国国内,特别是沿海省份在受到自十六世纪以来世界海洋经济作用力的不断冲击之后,已经具备了接受外来资本的条件,特别是鸦片战争之后,一批口岸对外开放,这种条件也就愈加成熟了。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清廷宣布《拟订华商办理实业爵赏章程》,鼓励海外华商投资国内办实业,“海外侨商能出资本创办实业局厂者,其功自不可没”。宣统三年(1911年),又发招致华侨的议论:“今日为吾闽实业之进步,欲得资本家以担当重任者,群以招至华侨为第一者。谓华侨雄于资财,为内地商界所弗及。果出其能力,为祖国扩张实业,保全利权,抵塞漏卮,无论为农为工为商,靡不为中国生也”。^⑤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开始走向衰落,世界性经济危机出现,东南亚各国经济是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组成部分,受经济危机的压力,华商把资本投向国内。^⑥所以,论及十九世纪下半叶到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华商投资,实际上是华商寻求发展以自强和出其能力为国强的积极行为。

在有资料可证的1871年至1949年的78年里,福建华商投资总额不如广东华商的

多,然而,泉州地区华商却以占有全省投资额近 80% 的比例表现出非凡的气魄

1871年—1949年福建华侨投资各地区统计表^⑧

金额:折人民币(元)

地 别	投资户数	投 资 额	占全省的%	地 别	投资户数	投 资 额	占全省的%
福州市	30	6 828 925	4 90	永春县	9	2 988 672	2 14
厦门市	2 668	87 486 598	62 88	莆田县	10	577 291	0 41
泉州市	529	7 993 511	5 74	漳州市	18	9 442 059	6 78
晋江市	632	6 726 137	4 83	龙溪县	20	2 981 750	2 14
南安县	61	3 078 570	2 21	其 他	65	9 752 760	7 00
安溪县	13	1 333 534	0 94	合 计	4 055	39 189 807	100 00

按道理而论,华商投资户数与投资额应与该地区华商人数成正比。但是投资行为与捐赠行为不同,它首先是经济行为,所以,生产条件与市场条件是十分重要的。厦门市以其港埠开放,市场比较成熟而成为华商的投资重点。泉州市、晋江县也因其面海和悠久商业传统成为华商投资比较多的地方。

海外华人在泉州地区投资的项目包括工业、农矿业、交通业、商业、金融业及服务业、房地产业。工业中的重要工厂公司有 43 个(1905年—1949年),其中包括陈嘉庚的厦门大同酱油厂(1907年),资本额为 160 000元(折人民币),其中侨资 15 000元;蔡子钦的泉州电灯公司(1913年),资本额 245 000元(银元),其中侨资 213 450元;李少华的厦门电灯公司(1914年),资本额为 840 000元(银元),其中侨资 90 300元;林文角的厦门民生电动染织布厂(1920年),资本额 210 000元(折人民币),其中侨资 147 000元;黄奕住的厦门自来水公司(1921年)等,资本额为 1 000 000元(折人民币)和 2 900 000元,其中侨资 700 000元和 567 400元;黄奕住又有独资厦门电灯公司(1921年),资本额为 1 000 000元(银元);黄奕住还有鼓浪屿中华电气公司(1928年),资本额 200 000元,其中侨资 158 000元;王志明的独资南安温陵制糖公司(1937年),资本额 200 000元(折人民币);颜子俊的侨资永春闽南华侨实验社(1943年),资本额 400 000元(国币);林为白的侨资厦门中原烟厂(1948年),资本额为

400 000元(折人民币)。^⑨

福建华商投资的农矿业重要公司 19 个(1916年—1946年),泉州地区占 15 个,其中最大的是李汉青侨资永春实业公司(1939年),资本额 1 700 000元(国币)。^⑩

华商投资的交通业集中在泉州和漳州地区,公路有十分之七是集中在泉州属县一带,分布于晋(江)、南(安)、惠(安)、同(安)、安(溪)等五县,以泉州为中心(如泉安、泉永、泉围、泉秀、泉洪等线);有名的漳厦铁路是联接漳州与厦门的交通线,可惜由于多种原因,高投入却换来了大亏损,最终垮台(1905年—1927年)。^⑪

华商在福建投资商业总额为 18 775 730元(折人民币,1871—1949年),排在房地产业(63 345 000元)和工业(19 243 268元)之后,位居第三位。^⑫但是,全省 81 家重要公司(1890年—1948年)至少有 78 家在泉州,大部分在厦门,而且绝大部门又都是侨资。^⑬

华商投资的金融业有 7 955 466元(折人民币)。^⑭绝大部分也在泉州地区,大银行家和他们的大银行多在厦门设立总行或分行。如李清泉的中兴银行(1927年),黄奕住的中南银行(1927年),李光前的华侨银行(1932年),陈厥祥与李光前的集友银行(1943年)等。^⑮

服务业在华商投资中比重较小,大部分也在厦门和晋江,如陈渊源投资 100 000元(银元)的厦门新世界娱乐场(1930年)。^⑯

华商投资最大的项目房地产,而且全是

